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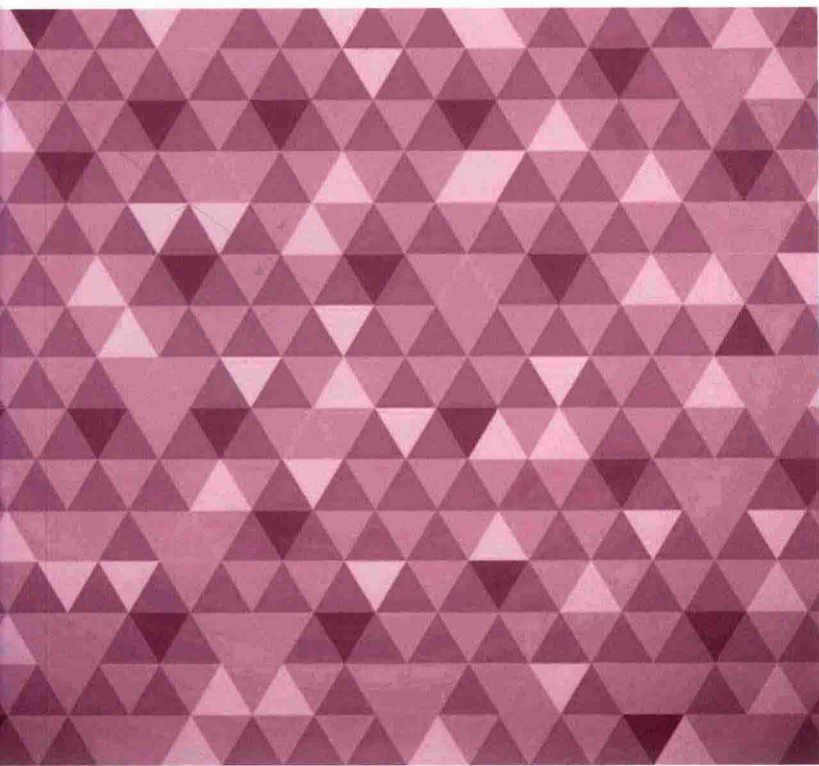
主编 阎纯德 吴志良



Sinological History Series
列国汉学史书系

美国汉学家卫三畏研究 (下册)

黄涛 著



學苑出版社

主编 阎纯德 吴志良



北京语言大学
列国汉学史书系

Sinological History Series

美国汉学家卫三畏研究 (下册)

黄涛 著

學苑出版社



语言资源高精尖创新中心支持项目



黄涛，男，1970年11月生，安徽桐城人，中共党员，历史学博士。字三寿，自号隐衷楼衰人。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美国汉学（中国学）、国际关系（中美关系史为主）。已出版专著多部，发表论文多篇，参与和主持各类社科课题多项，获奖多项。自2015年6月起至今任职于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教授。

列国汉学史书系第二辑

已出版

《美国汉学史》/熊文华

《法国汉学史论》/耿昇

《〈心经附注〉对退溪心学形成之影响研究》/周月琴

《马立安·高利克的汉学研究》/杨玉英

《郭沫若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与接受研究》/杨玉英

《意大利汉学史》/张永畚 白桦

《汉学视域——中西比较诗学要籍六讲》/吴伏生

《二十世纪国外中国文学研究》/夏康达 王晓平等

《唐诗在法国的译介和研究》/蒋向艳

《〈心经附注〉朝鲜半岛流衍考》/周月琴

《交错的文化史——早期传教士汉学研究史稿》/张西平

《〈孙子兵法〉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与接受研究》/杨玉英

《中国新文学俄苏传播与研究史稿》/宋绍香

《卫三畏与美国早期汉学》/顾钧

《美国汉学家卫三畏研究》/黄涛

《英语世界的〈易经〉译介研究》/朱睿达

《中国文学翻译与研究在俄罗斯》/宋绍香/编译

待出版

《美国汉学巨擘费正清研究》/黄涛

《从传统到现代：汉学的前世与今生》/阎纯德

《中国之欧洲——中国文化欧洲传播史》/[法]艾田蒲

许钧 钱林森/译

《汉学通史》/刘正

《中国古典文学法国传播史》/黎诗薇 [法]彼埃·卡赛

《英语世界的宋诗传播史》/万焱

《英语世界的南戏传播与研究》/林施望

《中医在法国的“返魅”》/贺霆

《日本诗经要籍辑考》/王晓平

《法国作家与中国》/钱林森

《中国文学在法国》/钱林森

《中国史家与美国汉学》/吴原元

《中国文化俄罗斯百年传播编年》/柳若梅/编

《日本汉学史》/[日]牧野谦次郎/著 李真/译

《宫崎市定史学思想研究》/王广生

有伯驾。在大沽(天津条约初步谈判在大沽进行)和天津有卫三畏和丁韪良。”^①伯驾是1855年被任命的美国第一个传教士出身的驻华公使,而在此稍前,卫三畏就走上了美国对华外交的道路。1855—1876年间,卫三畏一直是美国驻华公使馆秘书兼翻译,还曾9次代理美国驻华公使。同时,卫三畏还勤于研究和介绍中国传统文化,被誉为“一位审慎的观察家,也是各外国使馆中最习知中国情形的一位人士”^②。20年的外交经历占据卫三畏在华生涯之近半,对中美早期关系的影响尤为深远,正如史学家李定一所言:在早期中美关系史上产生影响的传教士,“最重要的除伯驾及裨治文外,影响美国外交甚远的,应推卫三畏”^③。

19世纪美国驻华使团的居住地并非北京一处,在广州、澳门、上海、天津等都有停留,这些地点都是美国赴华使团与清政府谈判签约的使馆暂住之地,因为清政府在条约规定外国公使驻京前,是不允许外国使团滞留北京的。直到在《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的基础上,外国公使进驻北京逐渐成为现实之后,美国驻华公使馆才在使团秘书卫三畏的努力下在北京稳定下来,中美外交进入到严格意义上的近代国际外交的范畴,清政府随后也向美国等西方国家派驻了使节。卫三畏为美国北京公使馆的建设有所贡献,对近代美国驻华使馆体制的形成也功不可没。

因为卫三畏的外交活动主要是在北京地区,故以“北京”代指晚清中国,来突出卫三畏及其对华外交活动在近代中美外交关系史上的重要地位。本章主要在叙述卫三畏以传教士身份参与的对华外交活动和职业外交官的重要活动的基础上,着重论述他对于近代中美外交的形成和发展所起到的客观影响,进而分析美国在华的传教士外交官对发展近代对华外交事业的历史意义。

第一节 卫三畏与早期美国远东外交

美国传教士来华后,一直在福音传教方面举步维艰,困难重重,究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悠久而积淀深厚的传统文化,及其在这种文化背景下的闭

① [美]泰勒·丹涅特著,姚曾虞译《美国人在东亚》第478页,商务印书馆,1959年。

② 《美国人在东亚》第288页。

③ 李定一《中美早期外交史》第15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关锁国政策。晚清的封闭、愚昧和自我优越的心理状态,构成了一道道抵御西方文化渗入的天然屏障,即使是“上帝的福音”也无法迅速打开中国的“门户”。对于在华传教士来说,要改变这种令人沮丧的局面,使中国皈依基督,前提就是要迫使清政府签订条约,结束其禁教和闭关政策。当和平手段无法达到这个目的时,传教士们便心照不宣地选择了战争和以武力为后盾的外交。自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美国一些传教士就“弃教”进入美国远东外交的世俗服务中,并在美国对华的一系列签约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1844年到1856年中国政局动荡的这段时期,卫三畏得到以传教士身份领略一些美国远东外交上重大事件的极佳机会。他曾经目睹了顾盛专使来华签约,参与了美国对日签约和考量太平天国运动等重大事件,这些成为他踏上职业外交官之路前的外交演习。这种心路的过程,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指导意义,非常有助于卫三畏此后在美国对华外交中的实践活动。

一、见习顾盛谈判望厦条约

美国在脱离英国殖民统治而独立后,内忧外困迫使其开辟了遥远的对华贸易。新独立的美国,“他们尤其穷得可怜”,“事实上,在革命结束的时候,最大多数的人民是穷困的。——穷困,失望,不满意。那些人,参加美国独立战争而且获致胜利的人,回到家里,贫穷不堪,饥病交迫,大多数身无分文,无以为生”。^①而战败的英国更“俨然以敌国和大国的姿态,制定若干航海条例,对美国的对外贸易严加限制。特别是英国政府不允许美国船只驶入英属西印度群岛,只许其他国家的商船载运美国的烟草、食粮和造船器材到这些岛屿等规定,严重打击了新英格兰的航运业、渔业和奴隶贸易,致使新英格兰经济陷于绝蹶境地。与法国和西班牙建立的平等互惠贸易关系也在战后不复存在,法国和西班牙将美国船只排斥于它们的殖民地或本国港口之外。至于美国在殖民地时期所建立的地中海贸易,也因海盗的骚扰,难以顺利进行”^②。为解决经济问题,美国必须寻找新的贸易出

^① 卿如楫《美国侵华史》(第一卷)第21、23页,人民出版社,1957年。

^② 乔明顺《中美关系第一页:1844年〈望厦条约〉签订的前前后后》第1—2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年。

路。1784年2月22日,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挂着簇新的星条旗,驶离纽约港,“穿过大西洋,绕过好望角,航行到印度尼西亚巽他海峡时与两艘法国军舰相遇,并随行于8月28日抵达广州黄埔港,揭开了中美关系的序幕”^①。“中国皇后”号在行程13,000英里后,安全抵达广州港。它首航中国的成功,不仅“为美国资本家展示了赢利的航向”,以致此后“波士顿、普罗维登斯、纽约和费城的资本家争先恐后驶往广州”,对华贸易迅速地发展起来。1790年,中国出口到美的商品总值占美国进口货总值的七分之一。1792年,美国对华贸易额已超过荷兰、法国、丹麦等国,仅居于英国之下。1803年,美国对华贸易的总值,超过了欧洲大陆诸国对华贸易的总和。19世纪上半期,美国对华贸易额仅次于对英、法、古巴的贸易,居第四位。^②更重要的是它打开了东方大国中国和西方新兴美国的通道,正如“中国皇后”号商务总管山茂召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所言:“我们有幸打通同地球极东部地区的联系,这必定是一个令人欣喜的信息。”^③因为这种通道非常有利于美商在广州的立足,为以后不断来华的包括传教士在内的美国人提供各种帮助,扩大美国在华的影响力。

贸易关系的顺利发展,中国越来越成为美国外贸的重要市场,对华贸易的结构也多元化起来,必然引起美国人对商业利润的非理性追逐。最初,美国对华贸易均需随船运大批西班牙银币到广州,并力求寻找可以运销中国的货物,以期减少现金输华的情况。人参、皮毛、檀香木等商品,不能弥补对华贸易的差额,而且来源也日渐枯竭,美商的眼光必须转到其他可资牟利的贸易上,在这种情况下,“鸦片自然成为目标之一”^④。因此,从19世纪初开始,为获得更多的商业利润,美国一些商人也开始了对中国的鸦片贸易。1805年,“有三艘美船自土耳其之司迈纳(Smyrna)运出鸦片一百二十四箱”,贩卖到了中国。^⑤从此,中美早期的正常贸易关系便“由于鸦片贸易的兴起而发生了质的变化。鸦片贸易不仅使中国的对外贸易从

① 李长久、施鲁佳《中美关系二百年》第3页,新华出版社,1984年。

② 乔明顺《中美关系第一页:1844年〈望厦条约〉签订的前前后后》第3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年。

③ 李长久、施鲁佳《中美关系二百年》第3页,新华出版社,1984年。

④ 李定一《中美早期外交史》第6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⑤ Tyler Dennett (泰勒·丹涅特), *Americans in Eastern Asia*,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22, p. 115.

出超变为入超,而且根本改变了这一国际贸易的性质”^①。逐渐地,美国对华贸易的逆差从鸦片走私中得到弥补。虽然鸦片走私是通过贿赂,在中国官员默许下进行的,是冒有不小的风险,但利润率大大超过一般的贸易,有时高达100%以上,从而为非法美商开辟了广阔的财源,却给中国带来了无穷的灾祸。19世纪30年代末开始的禁烟运动,是清政府维护国家民族尊严、保护合法国际贸易的正当举动,却成为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发动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借口。而美国政府也趁机追随英国来华胁迫战败的清政府签约,以保护中美正常贸易的幌子,暗中怂恿鸦片贸易的发展。这种国际关系的改变,导致了1844年顾盛专使来华谈判,并签订《中美五口通商章程》,即《望厦条约》。

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新生的美国的确是做生意的民族,这可能与它由商业资本向工业资本转化前的社会性质有关。对华贸易对于美国资本的原始积累起着重要作用。从事商业的资本家主要集中在马萨诸塞州,资本家形成的波士顿财团不仅操纵了马州的政治和经济,而且对联邦政府也有一定的影响。恩格斯曾深刻地指出:“美国人早就向欧洲世界证明,资产阶级共和国就是资本主义生意人的共和国。”^②在美国,政治也是一种生意,而生意又支配着政治。联邦政府看到对华贸易对商业资本和工业资本的作用,以及对美国航运业的发展和开辟更多的中国市场,所以在关税上对对华贸易多予以优惠待遇。对华贸易之初,美国政府就制定了一份税则:“美船由广州输茶入口,每磅只抽六分至二毫不等。美船由欧洲输茶入口,则每磅抽税八分至二毫六分不等。若外国船舶运茶入美,每磅抽税一毫五分至四毫五分不等。除茶叶外,其他货品,由外船输入者,皆值百抽一二·五的税则,由美船运入者,减低一半。”^③1789年,美国颁布的关税法又重新规定:美国船舶直接从东方输入的茶,每磅征税6—20分,从欧洲运入的则征8—26分;而外国船运来的同种商品,交15—45分。茶是中国输美的主要商品,以上的规定显然把对华贸易置于保护之下。到19世纪30年代后,对华贸易继续实行优待政策,这样既增加了美商的贸易利润,又削弱了他国商人对华贸易的竞争力,有利于美国发展对华关系。这种专注做生

① 汪熙《中美关系史论丛》第16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

② 恩格斯《致弗·阿·左尔格》1892年12月31日,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561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

③ 卿如辑《美国侵华史》(第一卷)第29页,人民出版社,1957年。

意的对华关系,制约了美国在针对中国禁烟运动的强烈对抗和武力征服的情形发生,使得来华的顾盛专使秉承和平谈判,以条约形式争取到与英国在《南京条约》中所有权利,可谓技高于英国“其下攻城”上的“其次伐交”。同时,上述美国的关税法内容,也成为谈判签订《望厦条约》中有关通商规则的重要历史依据。

顾盛专使来华,还需要一个前提,即美国政府在对华贸易之外是否需要发展中美正式外交关系。无可否认,建立中美两国之间的正式外交关系,是推动美国对华贸易的重要保证。第一次鸦片战争前,中美之间已有了频繁的贸易,尽管有鸦片走私的不和谐因素存在,但和清政府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这固然伏根于清政府坚守闭关政策,拒绝和外国政府发生联系,但立国之后的美国尚且缺乏向东方发展的海军力量,并与英国有若干纠纷亟待解决,而且又瞩目于北美洲西部的领土扩张,从而美国联邦政府对遥远中国的问题便漠然处之,没有致力于突破清政府的闭关政策,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虽然在“中国皇后”号直航中国成功后,1786年,美国开始单方面向广州派驻领事,但这阶段的驻华领事都没有与中国政府交涉的权力,既无薪金,也无津贴,不过是个荣誉职。到1840年,美国驻广州的领事更换了6人,他们都是由商人兼任。由于清政府从来不承认任何国家派遣来华领事的外交官身份,美国领事只能以美商首领的资格与广州行商周旋,因此他们既不能定期向美国国务院汇报任何与贸易有关的情报,而且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前美国国务院也从未向广州领事下达任何政府训令。中美之间长期没有外交关系和美国政府对华问题的忽视,引起了在华美商的不满和责难。其间有广州的美商曾联名致函美国总统麦迪逊(James Madison, 1751—1836),申述加强广州领事的作用,要求委任专任领事,购置领事馆等事项,但意见书到达华盛顿后便被搁置而始终没有回音。1821年发生的特拉诺瓦事件,广州知府和南海、番禺知县等会同审理,按清例判处特拉诺瓦绞刑。特拉诺瓦一案的判处使美商非常惊恐,他们荒谬地认为这是由于美国领事没有外交权和得不到美国政府的支持而处于不利地位所造成的冤案,因此要求同中国建立所谓平等的外交关系。尽管还没有法律意义上的外交关系,但随着美国对华贸易的发展,中美之间不仅发生了事实上的外交关系,而且还发生了一定的宗教和文化的联系。这种文化上的关系与贸易关系一样,也在随后的日子里,要求美国政府应该与中国发生超越于领事权利的使节关系。美国新教传教士能够披着基督神圣的外

衣,深入到社会的各个角落,了解各种情况,为本国的经济、政治利益提供各种情报和资料。随着美国对华贸易的发展和需要,传教士来华活动便成为一种内在的需要了。1807年,美国国务卿麦迪逊和部分对华商人支持英国伦敦传教会的马礼逊首先来到广州。1830年,美国海外布道会(美部会)也派遣裨治文和雅裨理来华传播福音。在华美商对传教士前来中国布道予以大力的财政支持,使得此后美国传教士陆续来华。传教士在华除学习中文和传教外,还从事出版、译书、医务和教育等工作。这些工作将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历史和文化、民风 and 宗教等信息向在华美国人和美国政府及民众传播,成为美国社会了解中国的重要情报渠道。因此,从国家政治关系的角度,这些来华传教士实际上成为美国政府发展与华外交关系的最重要的一支力量,正如第一位美国来华新教传教士裨治文所言:“我等在中国宣教之人,与其说是由于宗教的原因,毋宁说是由于政治的原因。”^①美国传教士在华传教方面的成果是微不足道的,在清政府严禁基督教流传及基督教教义与中国传统礼教格格不入的情境下,到1839年,领洗者不到100人,而且主要是给外商服役或经营贸易的所谓下层人士。^②而最终促成美国政府下决心派遣使节来华谋求外交关系的传教士,就是伯驾。彼得·伯驾(Peter Parker, 1804—1888)生于马萨诸塞州,1831年毕业于耶鲁大学,1834年被美部会派遣来广州,成为基督教第一个来华传教医生。1835年11月4日,他在广州新豆栏街7号的丰泰洋行内租屋开设“广州眼科医局”(Canton Ophthalmic Hospital),又称“新豆栏医局”。这是中国第一所新式教会医院,西医自此正式传入中国。而这位医务传教士却对政治具有浓厚的兴趣。就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的年底,伯驾回到美国后,到处发表演说。1841年1月,他拜见了即将离任的美国总统范布伦和即将就任的新国务卿韦伯斯特,报告了中国的时局,要求美国政府把握中英战争的时机,立即派遣一位全权使节赴华,强迫清政府签订条约。回华前,他又拜谒了美国新任总统泰勒(John Tyler, 1790—1862, 美国第10任总统)和国务卿韦伯斯特,再次强调了美国政府应该立即派遣专使前往中国订约。伯驾的鼓动到底还是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1844年顾盛使团

① 王子兴《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第三单元第38页,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藏;或《基督教人士的爱国运动》,《人民日报》社论,1950年9月23日。

② W. H. Medhurst, *China: Its State and Prospects, with E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Spread of the Gospel* (麦都思《中国的现状与展望,附福音传播情况》), London, 1842, p. 362.

中,他与裨治文一起充当中文秘书,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望厦条约》中有关领事裁判权和美国人在华社会生活与思想文化活动的条款,集中反映了传教士的利益和要求,因而有美国学者认为,以上两项条款“是为特别优待伯驾而加入的”^①。美国政府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汇合各方意见,终于决定了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的对华政策,即尽量避免与中国发生正面冲突,同时利用英国侵华之机,谋取自身的利益。随着鸦片战争对英国有利局面的出现,引起了美国社会对中国问题的关注。联邦政府在当时仇英的气氛下,尽力避免被卷入中英战争,但站在美国利益的立场上,仍派遣海军准将劳伦斯·加尼(Lawrence Kearny, 1789—1868)率领美国东印度舰队前往中国海域,负责“保护美侨生命财产与防禁美船或他国船只悬挂美国国旗走私鸦片”。这个舰队由旗舰“星座”号和炮舰“波士顿”号所组成,于1844年3月22日抵达澳门。然而实际上根本“无侨可保”,且禁止鸦片走私也是不可能的。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刺激了加尼向中国索取特权的欲望,他超越了其职权的范围,俨然以美国全权公使的姿态,于10月8日致函两广总督祁贡(1777—1844),要求美国人享受最惠国待遇。年底,祁贡上报加尼要求的奏折到达北京,清廷断然拒绝。但直到1843年春,清政府和广东地方当局都在西方船坚炮利的威胁下,决定对西方各国一视同仁,同样赋予最惠国待遇。1843年5月,美国国会两院通过了总统泰勒的建议,决定派国会外交委员会委员顾盛为专使赴华,并给予顾盛几个训令,如“在这个帝国同英国之间的战争所造成的后果中,包括四个重要港口对英国商业的开放,就是厦门、宁波、上海和福州”;“目前由你所担任的我们派往中国的使团的主要任务,就是使美国的船只和货物,在同英国商人所享有的同样有利条件下,进入这些港口”;“应以断然的辞句和坚定的态度表示,如果任何国家的人民从帝国获得的特权或商业便利较美国人民所获得的为大时,美国政府认为不可能继续同皇帝保持友好关系,并予以尊重”。^②同时,美国政府正式向清政府提出了威胁口吻的外交照会:“英国在中国的特权是以条约的形式庄严地得到认可的,而美国在华利益则凭皇帝的恩准。即使美国商人愿安于现状,华盛顿却有人不同意。美国曾为了

^① G. B. Stevens and W. F. Markwied, *The Life, Letters, and Journals of the Rev. and Hon. Pater Parker, M. D.* (史蒂文斯、马克威尔《伯驾传》), Boston, 1896, pp. 170-172, 175, 234.

^② 李长久、施鲁佳《中美关系二百年》第10—12页,新华出版社,1984年。

从大不列颠获得独立进行过一场战斗,高傲的美利坚合众国应该有自己的条约。”^①1844年2月,顾盛使团到达澳门,开始了与清政府近半年的签约谈判,到7月3日,中美《望厦条约》终于在美国的胁迫下正式签字。

当然,顾盛使团来华,也与顾盛本人的努力有关。顾盛(Caleb Cushing, 1800—1879)出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埃塞克斯县的新柏里港。其父约翰·纽马奇是当地的航运资本家,在美国独立以前就远航英国、印度从事外贸活动,独立后,随着美国海外贸易的发展,又将贸易扩展到北欧诸国,攫取了巨额财富。顾盛自小受到家庭和亲朋的影响,养成了关心资本家的利益和向外扩张的心理。从13岁时,顾盛考入唯一神教派主办的哈佛学院,博览群书,打下了坚实的文科基础和写作能力,为他今后登上政治舞台准备了条件。1817年,升入哈佛学院法律专修科,毕业后从事律师工作。1820年,哈佛学院延请他为数学和哲学教师,同时攻读硕士学位。1824年,他被选为马萨诸塞州议会代表。此后,他的政治活动并非一帆风顺,直到1835年,才在韦伯斯特等的支持下作为辉格党的候选人,击败了奥斯古德,当选为联邦众议院议员。成为众议员是顾盛登上政治舞台的起点,进入众议院后被分配为外交委员会委员,从而使他的“天命决定论”的扩张主义倾向越加明显。他在1839年国庆演讲会上宣称:“我认为根据天命所定,美国负有增加这个大陆的人口和提高其文化、文明的责任。美国稳步而快速的发展,将给这个新世界增添文明和基督教的幸福,我预感到美国定有无穷的力量去完成这些天赋的使命。”^②所以可见,对中国的扩张也是他的天命观的一个组成部分。顾盛对中国是抱有反感的,其原因首先在于他家乡的商人和在华商人之于中国的诋毁,使他自幼就视中国为愚昧落后的东方大国,其次是他在包括哈佛学院学习期间没有获得有关中国的正确认识,因为那时的中学史地教科书大多极力贬低中国人的道德品质,歪曲中国的形象,就是盛名学府的哈佛图书馆也缺乏较为深刻论述中国的图书。因此,从其出身、教育和政治环境来看,顾盛无疑是一个富于侵略性的资产阶级政客,他出使中国并胁迫清政府签订中美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就是一个不用疑惑的结果了。要达到这个目的,顾盛全力支持总统

① [美]孔华润(Warren I. Cohen)著,张静尔译《美国对中国的反应:中美关系的历史剖析》第10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

② 顾盛《美国的财富增长和领土扩充,1839年7月4日于麻省斯普林菲尔德的演讲稿》,转引自乔明顺《中美关系第一页:1844年〈望厦条约〉签订的前前后后》第61页。

泰勒,成为众议院中诨名为泰勒的“警卫小分队”的一个成员。泰勒总统为了酬谢顾盛的拥护,也曾竭尽心机地委他重任,财政部长沃尔特·福沃特辞职后,1843年3月2日,泰勒曾经三次提名顾盛继任这一高职,都遭到参议院的否决。^①早在1842年12月27日,顾盛致函泰勒总统,说明派使节到华的客观条件已经成熟,可以名义上派遣非正式的使节团,以期获得甚至比英国在《南京条约》中更多的权益。泰勒总统在顾盛的推动下,采取了行动,于31日向众议院提出咨文,建议向中国派遣外交公使。这篇出于国务卿韦伯斯特之手的咨文,是以顾盛的信为蓝本,直接体现了顾盛的遣使订约的观点,既把得到英国所获得的权益作为向中国提出要求的基准,又把与清政府直接谈判作为第二步行动。1843年1月24日,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亚当斯向众议院提交了一个向中国派遣代表的报告和“720号议案”,其中,“720号议案”是按照“1790年7月1日法案”的规定,要求国会拨款4万元,作为派代表赴华订立“平等互惠商约”的经费,费用分配为:9000元为公使的年俸,9000元为公使的办公和生活费用,代办和秘书的薪金为4500元和1350元,其余为使节团的经费。2月21日,众议院表决,以96票对59票,通过了附有亚当斯修改意见的“720号议案”。3月3日,参议院讨论后,总统在这个议案上签字,“720号议案”正式成为美国的一项法令。遣使来华即将施行,但公使人选一时难以定下来,直到5月8日,总统泰勒在国会休会期间,任命顾盛为“赴华全权公使”。^②顾盛使节团于1843年7月31日自华盛顿启碇赴华,直到顾盛一行已在澳门同清政府周旋谈判几个月后,美国参议院才于1844年6月17日通过了顾盛使团的任命书。顾盛来华在美国国内是意见纷呈的,但也不乏赞许之声,认为他是最合适的人选。

以签约专使的身份来华后,顾盛立即同两广总督程裔采交涉,要求到北京向皇帝呈递国书,希望与中国订立“永远和好条约”。他的要求被拒绝后,就用炮舰相威胁。1844年7月3日,他同清朝钦差大臣耆英在澳门附近的望厦村签订了《中美五口通商章程》,即《望厦条约》。这个被清帝国政府称为《望厦条约》、被美国政府称为《顾盛条约》的章程,除获得了英国在《南京条约》及其附约中的一切特权外,还为美国人增设了更多的重

① 《中美关系第一页:1844年〈望厦条约〉签订的前前后后》第62—63页。

② 《中美关系第一页:1844年〈望厦条约〉签订的前前后后》第51—56页。

要权利,范围进一步扩大的治外法权,通商口岸的关税权,以及在此建立教堂、医院的权利。对于该条约的签订,顾盛本人自鸣得意:“美国及其他国家,必须感谢英国,因为它订立了《南京条约》,开放了中国门户。但现在,英国和其他国家,也须感谢美国,因为,我们将这门户开放得更宽阔了。”^①美国总统泰勒也说过:“《望厦条约》已将美国对华关系,放置在一个崭新的立脚点上,万分有利于美国商务以及其他利益之发展。”^②《望厦条约》成了此后清政府和法国以及其他国家订立不平等条约的范本,如同美国史学家丹涅特就把《望厦条约》看作是一个典型条约,因为它比《南京条约》“要高明得多;而且如此的高明,以致它立即变成为几个星期之后议定的法国条约取法的典型,也变成为 1847 年 3 月 29 日签订的对挪威和瑞典条约的蓝本”。^③当然,从遣使来华到《望厦条约》签订后,我们可以发现美国政府早期对华政策的变化轨迹,清楚看出美国国家利益至上的对华外交原则,同时,这一过程也充分暴露出其在侵华的本质,与英国是一致的,区别的只是采取方式的不同罢了。^④

顾盛专使来华和谈判订约,对于卫三畏走上职业外交官道路具有开创之功,可谓是他目睹了美国对华开展外交活动的第一课,意义自是重大的。这些影响作用,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

首先,顾盛使团来华的阵容与不达目的不罢休的作为,让卫三畏感到外交事业对其祖国利益的重大意义。美国政府派使来华的政策方针既已确定,组织使节团被提上日程。时国务卿之子弗莱彻尔·韦伯斯特为使团秘书,负责书写(英语)公文,保管档案。随同使节团赴华的舰队司令是福克斯赫尔·A. 帕克。随使节团医生一职由顾盛邀请伊莱沙·凯恩充任。顾盛还选了乔治·R. 韦斯特为秘书,韦斯特时为华盛顿《国家情报者报》的副主编和美国研究院的主要组织者之一。此外,顾盛还在国务卿韦伯斯特的允许下接纳了一些青年作为自费随员,他们的职责也是做秘书工作,也借机到国外旅游观光,包括约翰·R. 彼得斯、约翰·H. 奥唐奈、罗伯特·L. 麦金托什和斯坦尼斯拉斯·亨尼斯。美国政府调遣四艘军舰组成

① 卿如楫《美国侵华史》(第一卷)第 79 页,人民出版社,1957 年。

② 《美国侵华史》(第一卷)第 81 页。

③ [美]泰勒·丹涅特著,姚曾虞译《美国人在东亚》第 150 页,商务印书馆,1959 年。

④ 赵玉华《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美国的对华政策浅析》,载《四川师范学院学报》2000 年第 5 期,第 41 页。

了所谓的随行舰队,声势浩大。旗舰是蒸汽机火轮护航巡洋舰“密苏里”号,其他三艘为双桅护航巡洋舰“布兰迪瓦恩”号、小帆船炮舰“圣·路易斯”号和方帆双桅舰“佩里”号。“密苏里”号是当时美国最大的两艘火轮军舰之一,装有28英尺的明轮和10英寸(1英寸 $\approx$ 2.5厘米)大炮一门,也是美国第一艘远渡大西洋的火轮。四艘军舰来华的计划,“圣·路易斯”号和“佩里”号从美国穿大西洋,绕好望角到孟买停泊。使节团乘“密苏里”号,由“布兰迪瓦恩”号护送,驶往直布罗陀,再改乘其他船只由地中海前往孟买,“密苏里”号和“布兰迪瓦恩”号则沿非洲西岸南下,也到孟买抛锚。一旦使节团和四艘军舰会合后,结对前往中国。在组织使团的同时,顾盛为了便于将来与中国政府谈判,还搜集了不少国际法和有关中国的材料,以期扩大和加深自己对中国的理解,他认为此次出使中国,除负有政治、经济使命外,还有宣传西方文化的重要任务。1843年7月31日,顾盛使团从华盛顿启碇,后横渡大西洋,穿过地中海,9月7日,改乘英国邮船“东方”号由地中海向东行驶,再相继渡红海、阿拉伯海、孟加拉湾,进马六甲海峡,最后入南海,1844年2月24日,乘“布兰迪瓦恩”号到达中国澳门。在208天的航行中,顾盛曾经先后在直布罗陀、马耳他、埃及、亚丁、印度等地,了解了英国和美国对于这些地区的侵略行径,也听到了一些有关中国的信息,从中领会到一些可用于与中国政府进行交涉的手法和将来所订条约的新内容。他在整个旅行途中,曾给国务卿写了30封信,共280页,其中不少篇幅汇报自己的观感和“收获”。其中一份给继韦伯斯特之后而为美国国务卿的厄普舒尔(Abel Paker Upshur, 1790—1844)的信中,顾盛竟以西方国家的强盗逻辑为英国的殖民活动辩护:“在西方商业国家之间,彼此有法律的约束,互相承担义务。但阿拉伯、亚洲和非洲的国家的状况,就大大不同了。如果不采取诱导或强制的手段,迫使它们承认国际之间的‘平等原则’,逼使它们和基督教国家订立‘公正的条约’,建立‘友好的关系’,而对它们进行征服,也不能称为侵略。”这实际上就是为他此次来华胁迫清政府签约提供做贼心虚的心理安慰。其实,早在1843年6月17日,顾盛在庆祝邦克山纪念碑宴会上曾对泰勒总统表示:“我光荣地被任命为和平的使者,并被赋予把亚、欧、美大陆旧新世界的文明,在可能的情况下,结合在一起的任务。虽然过去东方古老的文明和学术启迪了整个文明世界,但现在的西方文明又返照着东方,我们现在已经成为我们教师的教师。先生!我将去中国。如果我可能在文化方面这样表现自己,三

亿亚洲劳动者的大门将对美国开放。”寥寥数语,可以看出顾盛的狂妄和对中国的鄙视,他虽然自称为和平的文化使者,而实际上去完成侵略使命。^① 为了实现他的中国将对美国开放的目的,在赴华途中和与清廷谈判中,顾盛确实发扬了他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毅力与勇气。在离开美国之前,顾盛就得到了时任美国国务卿韦伯斯特给他的训令。“韦伯斯特训令”传达了泰勒总统任命他为驻华专使兼特命全权公使的命令外,主要阐述了两个方面的内容:顾盛使团出使中国的目的和达到目的的方式方法。使华的目的是要为美国谋取在华商业利益,就像英国在华五口通商一样,获得与《南京条约》相似条约的权益,甚至可望到达北京觐见皇帝本人。顾盛使团打着和平的旗号,“使(中国)政府和人民充分相信:你的使命完全是平和的;你的此行并不怀有敌意和制造麻烦的目的;你是一个由美洲的最伟大的国家派到亚洲的最伟大的帝国为表示敬意与友善并建立友好的交往手段的和平使者”,同时辅以恫吓手段,但慎用武力,“要在一切场合维护并坚持自己国家的平等与独立地位”。^② “韦伯斯特训令”是美国对华关系的第一个外交文件,它的内容详尽、严密而周全。训令所阐述的原则成为早期美国对华关系的基础,美国对华政策初见端倪。这些原则有:商业利益原则,这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原则,是中美关系的基础;不占领土原则,这是近代史上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特点;谋取更多特权的原则,这条原则的运用,扩大和加深了美国对华侵略。尽管后来美国对华政策有很大的改变,对华关系又融进了许多新内容,但“韦伯斯特训令”所阐述的原则却一直未改变。^③ 带着“韦伯斯特训令”启程赴华的顾盛,于1843年11月15日到达印度孟买时,就听到清政府向西方国家开放五口的消息,而且,早在8月1日,清政府已在与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加尼和代理广州领事略京交涉后,正式准许美国在五口通商,并且减少了人参和铅的进口税。清政府所推行的对外“一视同仁”政策,使顾盛来华以前其使命在客观上已经完成。在这种情况下,顾盛再到华和清政府谈判通商事宜,就不免遭画蛇添

① 乔明顺《中美关系第一页:1844年〈望厦条约〉签订的前前后后》第77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年。

② 阎广耀、方生《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选编》第20—22页,人民出版社,1990年。

③ 刘吕红《试论“韦伯斯特训令”与〈望厦条约〉的关系》,载《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5年第4期,第19—20页。

足之讥了。使节团业已将到中国国门之外,无论如何也不能返棹回国。^①于是,顾盛从“韦伯斯特训令”中找到了与清政府必须签约的理由。在“韦伯斯特训令”中,美国政府希望顾盛“成功缔结一个像英中两国之间已经缔结的那种条约。如果这项条约包括更完备和更正规的条款,它会引导中国的交往朝着接受管理欧洲和美洲国家的国际关系原则更前进一步”^②。这实际上暗示着一种超越《南京条约》之上的权益诉求。按照当时国际惯例,一个国家向另一个国家遣派使节,必须经过协商,征得派往国的同意才能进行,否则不能派使前往。而美国政府事先不经过与中国政府进行任何磋商,便擅自遣使来华要求订立条约,是典型的强权行径。美国有这样遣使的突然举动,就在于中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败北。当顾盛使团遽然在澳门登陆后,清政府欲阻止谈判也就难以奏效了。自1844年2月开始,顾盛使团首先以“进京”“面见皇帝”来恐吓清政府,后来声明除钦差大臣外,不与其他官吏谈判,不承认代署两广总督程裔采为交涉对手,甚至以战争相威胁。道光二十四年(1844)4月9日,程裔采的《阻止美使顾盛晋京折》到达北京,奏称美国来使欲来天津朝觐,并议通商章程,“其意在仿照英夷,并欲驾出其上”。虚骄的清政府终究经不起顾盛的恫吓,只好指派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的耆英为钦差大臣,到广东与顾盛交涉。5月31日,耆英以两广总督和钦差大臣的双重身份到达广州,代替程裔采担负起与顾盛谈判的任务。耆英认为自己的主要任务是阻止顾盛前往北京觐见皇帝,而顾盛的目的已是要在《南京条约》之外为美国谋求更多的权益,多利用清政府惧怕外使进京心理,不时以要求北上觐见相威胁,企图迫使耆英做出种种让步。从是年2月底到7月初,在四个多月的谈判中,顾盛使团竭尽全力使出各种手段,终于迫使清政府同意签约。7月3日下午四时,耆英和顾盛分别在所议定的4份中文和4份英文《五口通商章程:海关税则》上签了字。同时,顾盛将美国总统的国书交给了耆英,请其转呈清帝道光。这份国书的目的就是订立到五口贸易的商约。国书译文不妨抄录如下:

诚以为中华之辐辏,如甘徕我国之梯航,所最要者,浮梁万

① 《中美关系第一页:1844年〈望厦条约〉签订的前前后后》第81—82页。

② 阎广耀、方生《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选编》第22页,人民出版社,1990年。